

# 文物會變身？談院藏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的改製前後

■ 張莅、陳東和

《西清古鑑》為乾隆皇帝敕編的青銅器圖譜，收錄當時藏於內府的青銅器。囿於時代的知識背景，書中所錄的部分青銅器存在訂年和命名的謬誤。現今因為出土材料豐富，多數的疑問已得到解決。然而，仍有青銅器苦尋無可比對的資料，究竟這些器物是獨一無二的存在，或是另有原因？借助科技檢測的成果，為解開謎團帶來契機。



圖1 | 西周 鳳鳥紋四足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 | 清 梁詩正等奉敕撰 《西清古鑑》卷31 清乾隆20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## 獨一無二的器形：鬲還是鬲鼎？

院藏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（圖1）為清宮舊藏傳世器，此器曾著錄於乾隆皇帝敕編的《西清古鑑》（1751）卷三十一，書中題名曰「周四足鬲」。（圖2）觀察此器形制特徵，為侈口，平折沿，直立耳、束頸，器身為四袋腹，下接柱足。頸部飾長尾鳥紋，地填雲雷紋，足部飾雲紋及三角紋。全器通高24.2公分，口徑15.6公分。就鳥紋圖飾和柱足形態判斷，此器年代應屬西周時期。

若細究此器的器形類別，其束頸、分襠袋足的特徵，或可被歸為「鬲」。但是鬲一般為三足，且腹足不分，分襠的器腹通常和足部連貫（圖3），不若此器為四柱足，足部和器腹未相通。（圖4）此器的腹足形態較接近鼎的特徵，因此若勉強給予定名，或可將之稱為「鬲鼎」、「分襠鼎」。若再與鬲鼎（圖5）一類的形制比較，雖然此器的雙立耳和袋

腹、柱足可與之相類，卻未曾見有橢方體的四足形制。

除了器物形制之外，可據以判斷年代的特徵，為器頸上兩對相向的長尾鳥紋，此鳥身軀短小，冠羽下垂，喙下鈎略變形，向後拖長的尾羽為其主要特色，前端向下捲曲，後部向上捲曲迴旋，尾羽整體呈橫向的S形，與鳥身不連接，為學者所稱的分尾鳥型式。<sup>1</sup>此類型的長尾鳥紋約流行西周早中期，如陝西扶風齊家村出土的西周中期青銅簋（M19：46），<sup>2</sup>此簋口沿下的長尾鳥紋（圖6）與此器極為相似。

綜而觀之，院藏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無法找到完全相對應的歸屬器類。此器形制特殊，既非鼎、非鬲、亦非鬲鼎，未見於考古出土及其他傳世器，長尾鳥紋的圖式又明確屬於西周中期的特徵，獨一無二的器形著實令人費解。



圖3 西周 獸面紋鬲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4 西周 鳳鳥紋四足鬲 腹內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## 現身：X光檢測下的補鑄遺痕

有鑑於院藏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的形制疑點，特將該器送至本院文物科學研究檢測實驗室，利用X光電腦斷層掃描系統，獲取該器的X光影像。X光影像主要是利用物質對X光的吸收——穿透效應之明暗對比來成像。材料組成與厚度，皆會影響X光的穿透率。利用X光透視的影像，則可用於理解青銅器的內部結構，特別是鑄層掩蓋下的情形，如墊片分佈、孔洞破補情形、銘文內容等等，而這些資訊對於工藝鑄造和修復的辨識均有相當大的實質效益。

此次運用本院組建的XCT系統進行檢視，拍攝電壓為200kV，拍攝電流為 $300\mu\text{A}$ ，曝光時間為500ms。首先，據X光檢測圖像（圖7），可見此器的一側器耳下方，器腹上有一明顯的圓形孔洞補鑄痕跡，直徑約2.6公分左右。尋此線索，於相應位置的內壁，肉眼檢視則可見有不規則的橢圓狀龜裂痕。（圖8）第二，此器另一側立耳下的頸部鳳鳥紋，未見原有的襯飾雲雷地紋（圖9），取而代之

的是一圓狀凹痕，推測此處應該經過修整。第三，此器的雙耳與器身之間存在溢銅，後鑄痕跡相當明顯。（圖10）從X光影像（圖11）亦可以清楚看出此接合處鑄接材料情形。另外，X光影像中立耳外緣所顯示出的不均質穿透特性，可以判斷立耳本身的鑄造品質與器身不同。據上述跡象所循，院藏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原器腹壁上的圓形補鑄遺痕，推測為流嘴斷失後形成的孔洞，並經過填補。另一側的器頸和腹壁則有打磨痕跡，則可能為分鑄的「鑿」（把手）脫落之處。最後，現在立於口沿上的兩個立耳應為後加。

進一步仔細觀察鑄造遺痕，可見全器共有八道垂直範線，除了器身四袋腹的界隔為分範處，每一袋腹的正中鼓凸處亦可見範線，因此器頸的鳳鳥紋尾部圖飾為範線打破。若以前述三個線索重新想像本來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的面貌，於腹壁重建流嘴和把手，再除去雙耳後，這樣的器物形制已經非常清楚，那就是青銅容器「盃」。



圖5 | 商末周初 父己鬲鼎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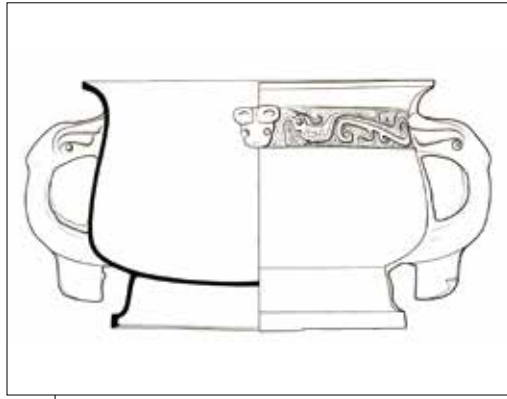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6 | 西周中期 作旅旅簋 陝西扶風齊家村出土 線描圖取自曹璋主編，《周原出土青銅器》，冊8，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5，頁1570。



圖7 | 西周 鳳鳥紋四足鬲 X光影像 國立故宮博物院文物科學檢測紀錄

### 來源探究：青銅盃的發展與演變

盃的形制特徵為碩腹，器腹一側有斜出的長管狀流，另一側為鑿，通常是三足或四足，並配有器蓋，蓋和器身之間多以鏈索連

接。<sup>3</sup> 青銅盃的使用與流行期長，從商代至戰國時期皆可見其蹤影，因跨越的時間長久，於型態方面有顯著的變化，並且展現區域性的特色。



圖8 | 西周 鳳鳥紋四足鬲 器內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0 | 西周 鳳鳥紋四足鬲 耳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9 | 西周 鳳鳥紋四足鬲 器腹壁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1 | 西周 鳳鳥紋四足鬲 耳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青銅盃的器形源自於二里頭時期的陶盃、陶鬶，較早的型態為流在頂上的封口盃，其後的形制演變主要表現在器腹差異，商代晚期至西周早中期常見高形盃（圖12）紋飾通常施於頸部。此類盃有三足與四足之分，袋足或作獸面造型（圖13），或以樸素的弦紋為飾。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出現圓扁壺形盃，器蓋、鑿和流嘴作具象的鳥獸形，生動奇麗。（圖14）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時則流行鏤盃，除了帶有提梁，流口也由長變短。<sup>4</sup>



圖12 | 西周中期 裘衛盃 陝西岐山董家村窖藏出土 岐山縣博物館藏 取自蔡汝芬、蔡慶良主編，《赫赫宗周——西周文化特展》，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12，頁185。





圖 13 西周早期 曾侯諫盃 湖北隨州葉家山M28出土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取自湖北省博物館等編，《隨州葉家山——西周早期曾國墓地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3，頁97。



圖 14 西周晚期 迷盃 陝西眉縣楊家村出土 寶鷄青銅器博物院藏 取自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編著，《吉金鑄華章——寶鷄眉縣楊家村單氏青銅器窖藏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8，頁193。



圖 15-a 西周晚期 季良父盃 「盃」字銘文拓片 取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，《殷周金文集成》，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院，1984，編號09443。



圖 15-b 西周中期 乞盃 「盃」字銘文拓片 取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，《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2002號墓發掘》，《考古學報》，2018年2期，頁236。

盃類器的稱名未見於先秦傳世典籍，主要根據部分青銅盃的「自名」而訂，例如出土於山西天馬曲村晉侯墓地的一件西周早期青銅盃銘文為「晉仲韋父作旅盃，其萬年永寶。」<sup>5</sup> 因而此類同型器稱為「盃」。郭沫若以西周晚期〈季良父盃〉（《集成》09443）的自名為例（圖 15），指出盃的金文字形就像

是手持麥桿以吸酒，為此字的初義，後則兼具諧聲功能。<sup>6</sup> 現今學者認為是手持桿狀物攪拌器皿中的液體，象桿狀物的「禾」形同時也標示字音，屬聲化的情形。<sup>7</sup>

關於盃類器的功能和用途，有著酒器之說和水器之說的認識進展，主張用途為酒器者，是在《說文解字·卷五·皿部》釋「盃」



圖 16 | 西周中期 夷曰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字為「調味也。從皿、禾聲」的脈絡下理解。王國維以清末官員端方所藏殷禁酒器組上有盃同列，而提出「盃者，蓋和水於酒之器，所以節酒之厚薄者也。」<sup>8</sup> 否定了盃字作為動詞的字義，導向器形與功能連結的指示，並將盃視作酒器。在酒器說的前提下，容庚認為盃的三足或四足設計，可用於加熱，具有溫酒的功能。<sup>9</sup> 陳夢家在盤與盃為成組用器的基礎之上，推測盃類器是用來煮香草的器具，使用香草熬煮而成的「鬱」，既可作為和酒的香料，也可用於沐浴盥洗。<sup>10</sup> 盃作為水器用途的證據則表現在墓葬出土的器物組合，張臨生以盤、盃連稱，並且配套出土的情況說明兩者關係密切；另一方面，盃與匜也存在名稱互相使用的例子，說明盃和匜分別可和盤組成水器，在西周中期「沃盥之禮」形成的情境下，盃當是作為注水的禮器。<sup>11</sup> 因青銅盃使用的時間跨度長，形制、紋飾乃至於功能都隨著時代演變，張懋鎔即是由器物功能轉化的角度，認為院藏〈夷曰匜〉（圖 16）恰恰證明了觥形器轉化為匜形器的樣貌，而匜形器又承接了盃形器的盥洗器功能。<sup>12</sup> 由過去學者們的研究進展，可知盃在商代晚期至

西周早期應作為酒器，約在西周中期之後轉化為水器，並與青銅盤配套使用。

假設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無雙耳，並且重新安裝上流嘴以及把手，成為「盃」的樣子之後，應屬於四足的鬲形盃。同類型的器物如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西周中期〈伯定盃〉（圖 17），兩件器物的束頸、袋腹、四柱足形制相同，頸部的長尾鳥紋也非常接近，後者器高 24.9 公分，尺寸相差無幾。透過比對，也可推知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原本應配有器蓋，並且器物時代約為西周中期。另外，出土器如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的〈克盃〉<sup>13</sup>（圖 18）以及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出土的〈芮伯盃〉<sup>14</sup>（圖 19）與其形制、紋飾相當，而不論作器者燕侯或者是芮伯，皆屬於西周時期的高級貴族，可以想見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原器主的貴族身份。

前述為一般常見的四足鬲形盃，然而，也不排除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原本具有特殊造型的可能性。如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曾



圖 17 | 西周中期 伯定盃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8 西周早期 克盃 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國墓地出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藏 取自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，《中國青銅器全集》，冊6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7，頁21。



圖 20-a 西周中期 匍盃 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取自河南博物院編者，《群雄逐鹿——兩周中原列國文物瑰寶》，鄭州：大象出版社，2003年，頁162。



圖 19 西周中期 芮伯盃 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出土 取自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，《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M2158發掘簡報》，《考古》，2019年1期，頁55。



圖 20-a 西周中期 匍盃 局部 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出土 河南博物院藏 吳雅婷攝

出土一件造型獨特的西周中期〈匍盃〉(圖 20) 其流嘴作雁首形，器腹成為雁身，雁尾下接龍首形鋈，器蓋與器身由一銅人作為鏈



環銜接，人形髮髻高束，上身赤裸，下身著褶裙，足穿短統靴。銘文內容描述器主匍獲贈牝鹿皮飾、蔽膝兩副以及純銅三十斤，並用以鑄作此件銅器。<sup>15</sup>

雖然現今已無法完全正確的重建院藏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原貌，但是透過 X 光檢測、考古資料的比對以及學術研究的啟發，除了基礎性理解器物原貌，亦增添對於此器的認識。

### 重獲新生：改製器的經歷

那麼，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為何會由青銅水器盃變成雙耳四足鬲的現貌呢？在明代的書籍中已可見到關於拼接改製銅器的記載，稱之為「屑湊銅器」。如明代書畫家張應文（約 1524-1585）於《清秘藏》中提及：「屑湊銅器，屑湊，謂搜索古冢舊器不完者，或取其耳，或取其足，或取其鑿，或取其腹，或取古壺蓋，作圓鼎腹。或取舊鏡面，作方片，湊方鼎身。亦用鉛冷釵湊合成器，法蠟填飾，點綴顏色，山黃泥調抹作出土狀。」<sup>16</sup>說明屑湊之意是將墓葬出土器中的破損銅器，取其殘存部件，重新組裝成一件完整的器物，例如以銅壺的蓋子當成圓鼎器腹，或將銅鏡改為方形，用作方形鼎的器身。

另也可見明代收藏家高濂（1573-1620）在《遵生八箋·燕閑清賞箋》所說：「又等屑湊舊器破敗者，件件皆古，惟做手乃新，謂之『改鑿』。余在京師，見有二物，一子父鼎，小而可用，花紋製度，人莫不愛。其偽法，以古壺蓋作肚，屑湊古墓碎器飛龍腳鐸上，以舊鼎耳作耳，造成一爐，非真正物也。一方亞虎父鼎，內外水銀，無一痕紋片，初議價值百金，製在五寸，適而可玩，人爭



圖 21 | 鐘式瓶（改製器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售之。余玩再三，識其因古水銀方鏡破碎，截為方片，四面冷鐸，屑湊古爐耳腳製成，工巧可謂精絕。」<sup>17</sup>敘述親眼所見的實際案例，並詳細說明兩件銅器如何拼接而成。至於改製的依據，也並非憑空創造，而是可能來自於對宋代吉金圖錄《宣和博古圖》的理解，因此，這些器物也呈現著當時改製者的銅器知識和賞玩喜好，並且這種改裝風氣特別盛行於明代晚期。<sup>18</sup>

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清宮傳世銅器中，可以找到不少改製器的例子。如原藏於熱河行宮的一件獸耳瓶（圖 21）原本應該是青銅鐘，經倒置後，在原來的鐘口接上器頸，朝下的鐘頂安裝圈足，在可能有破孔的鼓部裝上兩個獸首銜環，再於兩側置上獸首耳。<sup>19</sup>改製完成後，由傳遞古音的樂器變成了插花的古銅瓶。再如同樣曾經收錄於《西清古鑑》的院藏〈獸環尊〉（圖 22）原器應為兩周之



圖 22 獸環尊（改製器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23 夔紋奩（改製器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24 夔紋奩（改製器） 器外底銘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際車馬器中安裝於輪軸上的「車害」，原來的害頂變成器底，舊有的轄孔以東周的獸首銜環鋪首和爬獸填補，再加上三半環作為器足，整體被改製成類似於「尊」的用具。根據《故宮物品點查報告》，這件〈獸環尊〉最後的陳設位置是在養心殿後殿的多寶格中。可見重獲新生後，從原本的小小車馬器零件，搖身一變成為令人喜愛的古玩。又如院藏〈夔紋奩〉（圖 23），原本應是一獸面紋尊，器內底有「史」字銘文，推測器口或足部破損嚴重，而被雙雙截斷，保留帶有珍貴銘文的器身中段，改製時顛倒上下，再加上三小足，成為類似盒狀的「奩」，而原本在內底的銘文則變成在器外底。（圖 24）這件改製而成的〈夔紋奩〉，後來被乾隆皇帝與其他銅器聚集成套，收貯於名為「吉金耀采」的銅器匣中，並配有畫冊與之對照。（圖 25）

院藏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改製後，因原本的流嘴孔洞經補鑄完整，肉眼無法視明，故須透過檢測透視原狀。至於盃類器的長流和鑿的容易斷失，也有蛛絲馬跡可循，如乾隆皇帝的御製詩〈詠周素盃〉：「祖辛貽質製（西清古鑑中，以商祖辛盃為最古），伯矩作嘉賓（周伯矩盃，亦西清古鑑物）。流鑿都完好，方圓總樸淳（器圓而四足方）。當年調五味，式古緬先民。麟趾關雎意，於斯可問津。」<sup>20</sup>可見當時他所見的銅盃有不少是缺鑿斷流的，因此對於此件銅盃的完整性特別讚賞。而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曾經收錄《西清古鑑》中，故此器的改製年代不晚於此成書的乾隆十六年。

### 小結

西周〈鳳鳥紋四足鬲〉原為西周中期器物，歷經原器主的鑄造使用後，或經隨葬出

土，傳世遞藏，期間經補鑄改製，添加雙耳，轉盃為鬲，後載於乾隆帝的青銅器圖錄，現典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。據今約近三千年的時光歲月，經 X 光檢測，得以清楚明瞭。一件原本殘破的古物，幸運地在改製銅器的文化背景之中，得到全新的生命，並且成為銅器收藏、鑑賞文化及研究史的重要例證。

本文受惠於 106 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「重估『西清四鑑』：乾隆時期的古銅認知研究」（MOST106-2410-H-136-005-MY2），期間受益於本院器物處吳曉筠科長的寶貴意見，以及登錄保存處黃千奇女士協助檢測，在此併申謝忱。

張莅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 
陳東和任職於本院登錄保存處



圖25 | 清 乾隆 吉金耀采 冊頁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## 註釋

1. 陳公柔、張長壽，〈殷周青銅容器上鳥紋的斷代研究〉，《考古學報》，1984年3期，頁276-277。
2. 曹璋主編，《周原出土青銅器》（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05），頁1570。
3. 朱鳳瀚，《中國青銅器綜論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），頁295。
4. 張亞初，〈對商周青銅盃的綜合研究〉，取自《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——紀念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周年》第二集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86），頁60。彭裕商、韓文博、田國勵，〈商周青銅盃研究〉，《考古學報》，2018年4期，頁433-456。
5. 鄒衡主編、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商周組、山西省考研究所編著，《天馬——曲村（1980-1989）》，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00），頁500。
6. 郭沫若，〈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群銘文匯釋〉，《考古學報》，1962年1期，頁10。
7. 陳昭容，〈從古文字材料談古代的盥洗用具及其相關問題——自浙川下寺春秋楚墓的青銅水器自名說起〉，《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，71本4分（2000.12），頁875。
8. （清）王國維，《觀堂集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），〈說盃〉，頁151-153。此套挾茶酒器組現藏於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。
9. 容希白，《商周彝器通考》（上冊）（臺北：大通書局，1973），頁384-390。
10. 陳夢家，《西周銅器斷代》（上冊）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，原作為1964年），頁480-483。
11. 張臨生，〈說盃與匜——青銅彝器中的水器〉，《故宮季刊》，17卷第1期（1982秋），頁25-40。
12. 張懋鎔，〈夷日匜研究——兼論商周青銅器功能的轉化問題〉，收入《古文字與青銅器論集》（第三輯）（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155-163。
13.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，〈北京琉璃河1193號大墓發掘簡報〉，《考古》，1990年1期，頁24-25。
14.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，〈山西絳縣橫水西周墓地M2158發掘簡報〉，《考古》，2019年1期，頁52-55。
15. 李學勤，〈論應國墓地出土的匍盃〉，《平頂山師專學報》，14卷1期（1999.2），頁66-67；王龍正，〈匍盃銘文補釋并再論親聘禮〉，《考古學報》，2007年4期，頁405-422。
16. （明）張應文，《清秘藏（百部叢書集成據學海類編）》（臺北：藝文印書館，1967），卷上，〈論古銅器〉，頁4。
17. （明）高濂撰，李嘉言點校，《遵生八箋·燕閑清賞箋》（杭州：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，2012），頁26-27。
18. 許雅惠，〈晚明的古銅知識與仿古銅器〉，取自李玉珉主編，《古色——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3），頁270-271。
19. 在國立故宮博物院2003年舉辦的《古色——十六至十八世紀藝術的仿古風》特展，已指出此器的改製，並將其定名為「明鐘式瓶」。
20. （清）清高宗，《清高宗御製詩文全集》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1976），詩四集，卷25，〈詠周素盃〉，頁29。





# 四方 來朝

## 職貢圖特展

The Four Quarters Come to Court:  
A Special Exhibition of Envoys Presenting Tribute

2020

01/01~03/25

陳列室  
Galleries

210, 212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  
NATIONAL PALACE MUSEUM